

郎雄先生夫人包珈女士托人从台湾带来《从暴君到慈父——郎雄的如戏人生》一书。书中不少篇什都记叙了郎雄与李安浓浓的“父子情”。遇到李安之前,郎雄只不过是影剧界前辈,属硬里子。但六十岁后的十年间,因为《推手》《喜宴》《饮食男女》这“父亲三部曲”,他的艺术攀上了顶峰。而李安也在郎雄饰演的“父亲”角色中,倾注了对自己父亲的情感与爱恋,表达了对中国文化里父权的“敬”、“畏”与“抗拒”,从而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。戏里戏外,郎雄与李安也情同父子,李安照料郎雄饮食起居,郎雄则替他管理年轻演员,在生命最后时刻,郎雄一直刻意向李安隐瞒病情,以免干扰他正在拍摄的《绿巨人》。得知郎雄过世,李安失声痛哭,“郎叔走了,对我个人而言,是一个时代的结束……”

记得第一次和李安见面,是在一家名叫“洞庭春”的湖南菜馆,谭盾做东。那时,他俩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录制《卧虎藏龙》音乐。想象中的大导演应该威风凛凛,派头十足。没想到,出现在我眼前的李安,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深藏青茄克衫,下面配一条皱巴巴的米黄色休闲裤,灰白色头发也有些零乱,朴素得就像邻家

素颜的台北

很多年前对台北的认识来自一首歌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,悠悠远远的歌声,形成了“刻板印象”,于是,湿润的台北在视觉上似乎总隔着一层朦胧的水雾。即使没有雾气,和上海相比台北也不是个鲜艳的城市。信步所至,二三十年前建的房子比比皆是,它们见证着昔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的繁华记忆。如今,台湾经济不似以往那般繁荣,可在台湾人眼里,这里倒变得更适宜居住。很多人到外面发展,台北的人口密度不高,公共设施配套完善,却不似上海那样拥挤。台北的视觉是“旧”的,却不“陈”,没有那陈腐之气。好似家里的老红木家具,用得久了,有了包浆皮壳,格外的有一份内敛的优雅光华。又因保养收拾得干净,因此绝无陈腐之气。初到台北你不习惯,干净的街道上,找不到让路人丢弃皮纸屑的垃圾箱。马路上,最吸引眼球的不是什么炫目的豪车,而是摩托车,让人想起过往的岁月里,上海街头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。不过,在这个摩托车当道的城市里,秩序井然,行动便利的摩托车并不会随意违反交通规则,给汽车和行人带来困扰。

闲逛半日,渐渐地便会发觉,台北是个不容易让人产生陌生感和紧张感的地方。人们的脚步是从容的,脸上的表情是闲适的,说话的语调是温婉的,初来乍到的人,不知不觉地便放松下来。

入夜的台北是斑斓的,士林夜市、师大夜市……这个街那个街的夜市里,人头攒动。喜欢淘便宜而又时尚的物件女孩子,绝对不会空手而归。入夜的台北也是文艺的,24小时不打烊的礼品书店,不仅是当地人流连的所在,更是游客们必到之处。宽敞的店面,琳琅满目的图书,或站、或坐、或半倚书架……爱书人在此总有最自在的姿态与书相处。



理智与情感

曹可凡

大哥。而且,因为一条腿正发着“流火”,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他的态度极柔和,言谈举止很儒雅,说话慢条斯理,音调甚至近于细弱。印象中,聊天的话题也由郎雄切入,“郎叔的脸是五族共和,不论中国大江南北,两岸三地,哪个族群,甚至日韩新马,亚洲人,西方,只要看到郎叔,都觉得他像中国父亲,很难分析,无论我发掘表现他哪个面向,就是很中国,他就是中国父亲。他也不要做什么,但中国五千年来的压力像都扛在肩上。同时,他内在又自然流露出一种幽默感,很契合,就是‘形象’与‘气质’对味,又是极佳的演员。”接着,谭盾以兴奋的口吻谈起正在后期制作的《卧虎藏龙》,一脸疲惫的李安脸上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原来,电影筹资不力,李安甚至将自己的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。所以,包括谭盾在内的许多主创薪资都还欠着。向来乐观的谭盾轻轻拍拍他的肩头,“没关系,将来电影若大卖,你可以多付些钱给我!”李安坦言自小对武侠世界充满幻想,认

为那里寄托着中国人的情感与梦。只是港台武侠片大都停留在感官刺激层面。因此,他力求

把《卧虎藏龙》打造成一部有人文气息,弥漫布尔乔亚品味的武侠片。故事重心当然放在女主角玉娇龙身上,此角色层次诡谲多变,是个对江湖儿女情长有所幻想的难驯的少女。为选角,李安看遍南国佳丽、北地胭脂,遍一无所获。正当一筹莫展之际,忽然接到张艺谋一通电话。于是,刚刚拍完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的章子怡便走进了《卧虎藏龙》剧组。但玉娇龙在李安心中原是最富帅气的,可章子怡那娇滴滴的模样实在做不出他想象中的‘阴阳共存’特征。没办法,只得顺着性感、轻柔方向发展。“大家尽力了,章子怡被塑造出来了,将来红不红就看她造化了。”李安揀了一口菜,幽幽地说。

不过,李安似乎心有不甘,“不管怎么说,章子怡毕竟是张艺谋发现的。总有一天,我要打磨出一个能与我气息真正贯通的新人,并使之熠熠生辉。”直到拍摄《色·戒》,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。因此,李安对汤唯总是不吝溢美之词。她的气质与故事描述的王佳芝非常接近——她就像我父母那一代人,这种人现在凤毛麟角。她的外表不是那种令人眼睛一亮的美,但她最能诠释这个角色,她本身就带着那样的神韵。更重要的是,她就像女性的我——我觉得自己跟她有许多共同点,藉有假想,我从她身上找到真正的自我。”

200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,我又和李安重逢。之前,他凭借《断背山》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。但我好奇的却是《理智与情感》。让一个华语导演执导简·奥斯丁小说,就如同让斯皮尔伯格来拍《红楼梦》一样荒谬,但李安完成得居然如此出色。而“理智与情感”也是李安电影创作贯彻始终的母题。

事实上,拍《理智与情感》时,李安尚不具备国际知名度,却要面对爱玛·汤普森和休·格兰特那

新民晚报

故友何紫兄当年看到我偶写出的几篇随笔后,曾对我说:“你可以写一本《任溶溶看到的世界》。”这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。但我那时候还在壮年,编辑和翻译工作够忙的,根本不会怀旧,更没工夫写散文。不过每一想起他的话,倒也觉得谢谢父母让我到这世界上走一遭,所处的时代又是如此复杂,是应该把见闻经历写下来,让后来人看看。但也只是想想而已。

直到老了,忽然感到安徒生说的话有道理:老人怀旧是一种幸福,是一种快乐。于是在编报刊的沈毓刚、殷健灵、刘绪源、沈飞德、陆梅、沈琦华、葛昆元等同志的鼓励下,也真开始写起随笔来。到底活了近九十年,见闻经历中可写的东西不少,

样的巨星。况且英语也说得蹩脚。为此,他往往将摄影机放得离演员很近,用侯孝贤般的长镜头来展示影片的元素和精神,但立刻遭到演员质疑,这让李安感到苦恼与困惑。可是,他仍坚持运用中国艺术寓情于景方式,在多场戏中,将人置于画面中,使之与大自然产生呼应。“拍电影要有点 Street smart (街头智慧),要有点童心,不可被知识压住,才玩得起来。”李安说。拍戏时,他有时会以简洁但又有趣的便条与演员沟通,譬如,给爱玛·汤普森的便条上写“不要看起来那么老”。对休·格兰特说:“我希望看到你的内心戏。”在李安看来,以往都是西方文化强势,如今反过来,中国导演执导西片,文化回流有了可能。“西方处理东方题材时,一般而言不是十分尊重。如今我拍西片,则抱着一种低姿态,谦虚学习的心情去拍,但也尽量保有自己的思路和视角。”这些年,李安拍电影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,即拍西片时,竭力呈现东方情韵,拍国片时,又尝试西方影像语言。所以,无论“父亲三部曲”、《卧虎藏龙》《色·戒》,还是《理智与情感》《冰风暴》《制造伍德斯托克》,李安总能以其独特的优势,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狭窄的空间,在全球观众心中不断激起层层涟漪。换句话说,正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,成就了作为电影人的李安。

“两脚踏东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”,说的是林语堂。但,我以为,李安也完全受用得起!

就一篇篇写下来了。我是想到什么写什么,所写的东西正如老友倪海曙兄一本书名那样子:杂格龙冬。从年龄来说,从小写到大;从地域来

我看到的

任溶溶

说,有上海,有广州,有广东农村,有外地,甚至有外国;从时段来说,有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租界,30年代的广州,1938~1941年的上海孤岛,1941~1945年敌伪时期的上海,1945~1949年国民党时期的上海,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。这样回忆出来的东西还能不杂格龙冬吗?

倒是因为这些小文章杂格龙冬!是秋天来了,仿佛妖精的手指向天一弹,好了,晾在大太阳底下的衬衣,每一个褶皱每一个细节里都是桂花香了,在半掩的窗前喝一口水,也疑心喝下去的是一口桂花,更妙的是音乐,它们全完了,只要一响起来,一阵阵的桂花香就变成了穿插在摇滚乐空当里的喘息声,变成了小提琴不绝如缕的尾音,变成了一首首情歌微妙的过门……流着口水的娃娃从花园里跑过,他半张着甜腻的嘴,疑心自己的奶糖变成了桂花……是的,他还从来没有遇见一种花,香得如此嚣张,如此铺天盖地又如此之好。

有人折枝而行,那些花朵,是极细碎极家常的,每一朵小黄花,内心的声音有多强大,才能如此气韵悠长绵绵不断,将整个秋天,整座城都改陷了?而每一个香在其中的人,是多么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每一秒的呼吸,收晾衣服,赴约,闲逛,进入封闭的车厢之前……都要微微地踮起脚,悬浮在这好香中。

桂花香好,好在它提醒我们,这自然界中有一种气味,和人类,和人造完全无关,但是却坚韧强大,如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爱情,又好又混乱,慢慢地袭人,皮肤、内心、骨头,我们没有哪里可以幸免,被它完全地占有,一举动一呼吸,它都寸步不离又无法捉摸,当你欲罢不能,它却又倏忽远逝,再不回来。

这好香,于是充满了人生感,甚至有一点伤痛——万千落花 in 月夜里如子弹一样嗖嗖落下,只有王维能轻描淡写它是人闲桂花落。

而城市里的青草香,

冬,可能会让人看了开开眼界,觉得好玩,而有类似经历的人看了会回忆起一些往事来。因此非常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答应把它们印出来供大家一乐。

正因为这些文章太杂格龙冬,我特别要感谢译文出版社张颖同志和我的小儿任荣炼,他们为了整理它们可花费了不少精力。

最后我还要感谢刘绪源同志,他不但为这个集子写序,还给它取了个很雅的书名:《浮生五记》,并把这些杂格龙冬的文章分为五辑,取同样雅的辑名,这真是我莫大的荣幸。(本文为《浮生五记——任溶溶看到的世界》后记)

香得全世界最残忍,因为那是被割草机割开的。午睡,在轰响中,割草机席卷过草坪和小花园,各种植物被拦腰切碎。外祖母衣襟上的青草腥味,以比梦境强烈一百倍的气息冲进鼻子,甚至眼睛。童年的味道就这样被凌迟处死了,绿色血液溅满了刀口,带着残忍的快意

好香

王春鸣

深呼吸,好香。我在这样的草地和花园边上住着,一年年一季季目睹这血腥的绿色屠杀,不知道那些割

草机所为何来,有时会有一棵草幸免,它高高然而飘零地站在一地残茬之上,一棵草旷世孤独,一棵草千军万马,一棵草绝世幽香。

好香,秋天一到,便如约而来,如同爱情,如同赴死,在其余的季节里,我亦不焚香,不用香水,不爱玫瑰,也不读书,因为这一花一草,其余细枝末节的零碎香,在江湖山水间,虽各有一缕气息,却再难以动人。



街头 (油画) 姜天雨

尽管她们遭到严厉的批评,看到战士病情有了好转,心底还是充满了喜悦。经过十次输血,战士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,他变得胃口大开,饭量增加。浮肿明显消退,脸上有了红润。他开始在村子里跑前跑后地锻炼。

出院了。战士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他收拾好行李,背起背包向沈静她们告别。就要奔赴抗日前线了,他脸上洋溢着激昂和感动。他知道,非亲非故的姐妹们用自己的鲜血治好了他。现在,他与她们有着不可分割,血脉相连的亲情。他将带着饱含姐妹深情的一腔热血,奋战在抗日前线,立志把鬼子赶出中国。

沈静和谈纬青以及同事们,带着欢笑和依恋,把他送到村口。他挺直身躯,向她们庄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转身迈开大步向前走去。

1942年,陈实所在的抗日军政大学九分校,遭遇鬼子伪军三千多人围击。



会医院工作过的沈静,凭着仅有的医学知识和经验,和谈纬青大着胆子开始尝试冒险。第一天沈静抽出谈纬青40毫升血。用50毫升注射器加枸橼酸钠代替输血器,当即输给战士。第二天,沈静又献出40毫升血输给战士。这两天的输血,沈静和谈纬青非常紧张,不仅怕被发现,更担心输血发生意外。她们无时无刻不瞪大着双眼,仔细观察。还好一切正常,战士没任何不良反应。她们胆子大了起来,这样连续输了一星期。正要继续输下去时,不料被队长发现了。“你们的胆子也忒大了。冒这样的险,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?!”队长虎着脸,把她们劈头盖脸一顿训斥。随即,队长对战士进行了检查,惊奇地发现,病情有了好转。最终还是同意了她们再输血三天,输满十次的央求。看着她们软弱无力的样子,队长通知炊事班,给她们烧猪肝鸡蛋营养餐。